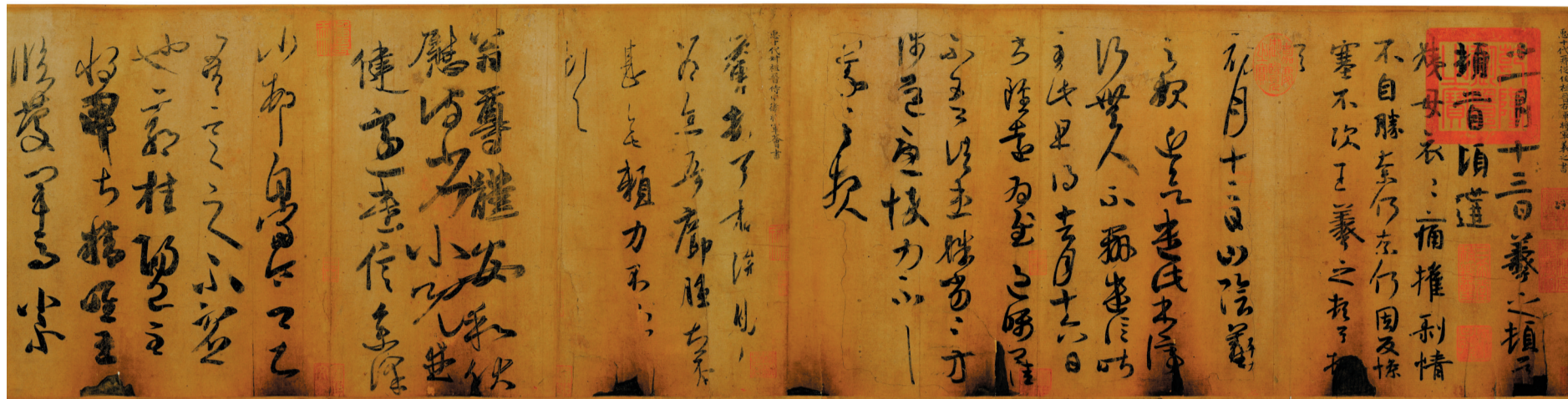


# “又见大唐”书法学术理论研讨会提出 接续大唐文脉 开创辽宁新书风

本报记者 杨 竞



《万岁通天帖》(资料片)

### 1 大唐书法的气象和特征,对辽宁书风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对辽宁书法学习传统、取法经典、向高峰迈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唐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唐代文化更是博大精深,在诗歌、绘画、书法、彩陶等领域创造了一座又一座高峰,其中,书法艺术成就尤为突出,无论是书法家、书体、流派还是书法理论,几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对大唐的整个书法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他说,综观唐代书法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初唐、中唐和晚唐三个阶段。书体上,真、行、草、隶、篆都出现了影响深远的书法家,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为代表的初唐四家,中唐出现的颜真卿、柳公权、张旭、怀素等著名书法家,开创了书法艺术的巅峰时期。

唐代书法兴盛的另一标志是书法理论的研究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代表作品有孙过庭的《书谱》和张怀瓘的《书断》,其论述高屋建瓴、视野开阔,对后世的书法理论有颇多影响。

苏士澍说,在书法艺术精神方面,唐代书法是多元的、丰富的,也是极具创造性的,体现在具象和抽象并存,最具有代表性的楷书和狂草都发展到了极致,达到了顶峰。从艺术创作的角度看,唐代是极其推崇法度的时代,唐代书法家对法度的理解十分宽泛,不限于技法层面,还包含艺术家在道德修养以及为人处世方面的行为准则。以颜真卿为例,其不仅在书法艺术上造诣精深,在道德修养上更体现出儒家的忠孝精神,这种精神使得他的书法有势不可当的磅礴之力,有着家国情怀,高标风骨,震撼人心。

苏士澍说,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和大唐盛世有许多相似之处,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荣,但当今中国书坛现状仍存在浮躁现象,尚缺少“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定力和扎实功力。我们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看到与古人的差距,时刻注重修正自身、研磨书艺、积淀学识。

大唐书法的气象和特征,对辽宁书风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对辽宁书法学习传统、取法经典、向高峰迈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苏士澍说,辽宁是书法大省,人才辈出,老一辈有沈延毅、杨仁恺等,有“九腕”等人才群体,有聂成文、王丹、胡崇炜等一批视书法为使命的领军人。其中,“九腕”在辽宁乃至全国都有名。上世纪80年代,全国第一届书法展是在沈阳举办的,对中国书法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同时,辽宁又恪守传统,注重继承,率先举办临帖班,从经典中吸取营养,并一如既往地坚持。辽宁书法的特点是有很强的书写性,这是辽宁的优势,上世纪90年代,辽宁的小行草书风曾风靡全国,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书法家。辽宁书法走在全国前列,与临帖学古人、学古法是分不开的。

### 3 开拓辽宁新书风是一个综合的概念,而不是某个方向,要和新时代辽宁精神结合在一起……辽宁文化基因里有钢铁文化,有海洋渔业文化,有农耕文化,这些都给辽宁书风提供了新的境界

“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中,一卷卷墨迹,用姿态万千的笔画,记录着国家兴盛、威德远播的全盛图景。书法家李琳说,“又见大唐”再次带领我们领略大唐书法艺术的辉煌画卷,从中也引发了我们对辽宁书法发展的诸多思考。唐代书风多样,我们辽宁行草、篆刻走在全国前列,但楷书、隶书还是短板,我们需要兼容并蓄,包容多样,开拓书艺的新境界。

关于如何开拓辽宁新书风。大连大学副教授万瑞杰认为,辽宁书风当“强其骨”“增其筋”。书家当体察东北父老乡亲豪迈性格,自觉寻求并营造辽宁书风切合点,建立起“辽海地域特色”及“辽海人文情怀”,为“辽宁书风”奠定新的坚实基础。

辽宁书法发展到今天,老一辈给我们确定了最宝贵的财富和正确的方

向。辽宁书法通过临帖班、通过国展,涌现出一代代又一代的优秀书法家,如宋慧莹、伦杰贤、魏哲、何连仁、朱成国等老一代书家,张世刚、武威、甘海民、施恩波等中坚力量,李琪、刘宏卫、刘长龙等青年一代正在成长,老中青三代书法家互相学习、促进提高。李琳、卢林、王祥、师索民、苏德永、王树清、赵立新、赵博海、董文广、李洋等,学古人、学古法继承传统,临帖班成为最受书法人看重、最踊跃参加的学习班,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文化品牌。这都是大唐书法的作用,大唐文化、大唐书法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了不起的。胡崇炜认为,开拓辽宁新书风是一个综合的概念,而不是某个方向,要和新时代辽宁精神结合在一起,这精神和我们的工业文明不能脱钩。辽宁文化基因里有钢铁文化,有海洋渔业文化,有农耕文化,这些文化

结合到一起构成的辽宁文化就是立体的,宏伟的,给辽宁书法精神提供了新境界。学古就要结合现实,胡崇炜强调:“我们要学唐人的境界,把古人的境界引到今天来,古人最大的境界就是能够静下心来,书法是一门让人安静的艺术,是一门写心写性写情的艺术,静下心来,沉下去。”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杨宝林说,“又见大唐”再现大唐雄风,是文化自信的表现。那么当下中国书坛,尤其是辽宁书坛应向唐人学习什么?唐代书家文化水平都很高,像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等都是士大夫,都是文人。唐代评价一个人的才能是“先文后墨”,文才第一,书法次之。古代书家都文墨相兼,大多数人是书写自己的东西,故而有浓浓的书卷气。而当下书家是文墨相离,只是抄录前人的东西,有

的还抄错。当下书家必须多读书,以缩短与古人的距离,才能接续文脉。

辽宁书法有悠久的历史,书家几乎没有不研究唐楷的,没有不涉猎唐代行草书的,“又见大唐”开展以来,辽宁的老中青书家都多次去辽博看展,很多书法家都为展览做了书法碑帖的讲解,让更多人了解大唐书法艺术。

东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朱利说,学古对于从事书法教学实践和学术研究,是一次重新解构。郭兴文、张振忠、王荐、卢林、梁骥等也认为,“又见大唐”展览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现实本身。

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书法精神。书家要在体现时代性,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扬探索精神,以书法为轴心,传播汉字文化和书写艺术。

本文资料片由辽宁省博物馆提供



“又见大唐”书法学术理论研讨会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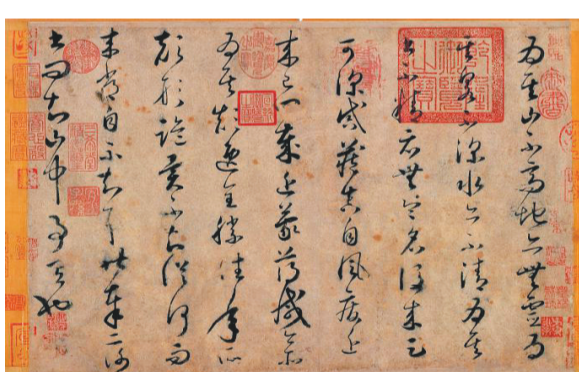
“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自10月7日在辽宁省博物馆展出以来,备受国内外观众的关注和喜爱,至今参观者络绎不绝……

“又见大唐”,我们见到了什么?见到的决不仅仅是某一项艺术的展览,而是整个大唐文化给予我们今天一种什么样的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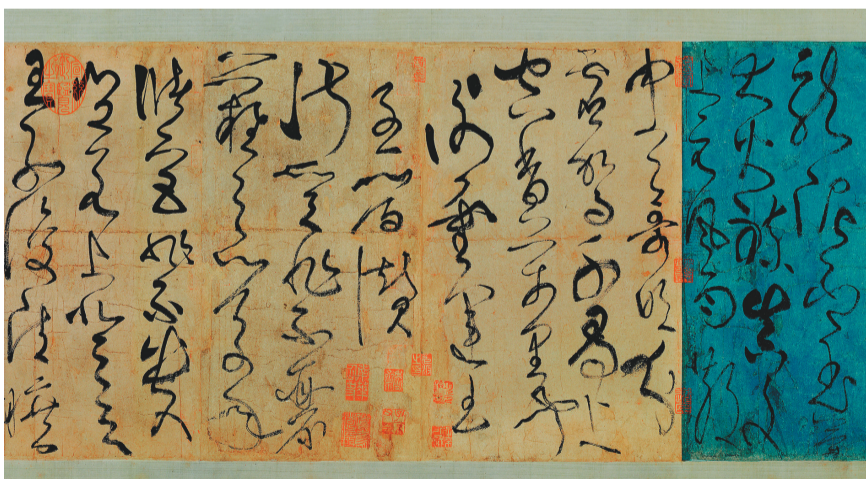
12月2日,由辽宁省文联、辽宁省书协主办的“又见大唐”书法学术理论研讨会在辽宁省会举行。来自省内外外的50余名专家、学者,站在大唐文化的脉络上,围绕当下书法的发展,如何传承大唐书法艺术,大唐书法对辽宁书风的影响,及如何开创新的辽宁书风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欧阳询《仲尼梦奠帖》(资料片)



怀素《论书帖》(资料片)



张旭《古诗四帖》(资料片)

### 2 当代书家无论是显性还是隐性,都从唐代书法的法度和精神得到启发。辽宁书法对大唐书风的承袭是世所公认的,唐风的影响在辽宁书家中更是无处不在

书法家李仲元说,大唐盛世书法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高峰期,书法艺术精品荟萃,名家如星,唐代书法中又展现了盛世大唐的宏大气象。“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展出的书法艺术品为我们研究书法内涵、艺术规律、时代艺术特征、唐代书法史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又见大唐”应理解为又见大唐。即把唐风在当代吹动起来,重要的是提高国人对书法艺术的鉴赏力、对书法美的感悟力。“又见大唐”亦是一个警示性展示,对那些胡涂乱抹、破坏规范、亵渎书艺的行为是一种示范性批判。

唐代书法对后世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书法家王丹认为,当代书家无论是显性还是隐性,都从唐代书法的法度和精神中得到启发。辽宁书法对大唐书风的承袭是世所公认的,唐风的影响在辽宁书家中更是无处不在。唐代书法,多样包容,壮阔雄强,是一代不可逾越的高峰,永远值得后世借鉴、弘扬与崇拜。

书法家胡崇炜说,辽宁是唐代书法传承最好的省份,是最早率先在全国举办临帖活动的省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临帖班,就没有辽宁书法的今天。

上世纪80年代初,人们还找不到书法的方向,如何继承书法艺术,杨仁恺、沈延毅等老一代书法家带动王贺良、孙德州、李仲元、陈复澄、姚志忠、徐焯、聂成文、郭子绪、董文9位当时的中青年书法家临帖学古人,这9人被称为“九腕”。1982年7月,“九腕”书法展在辽宁美术馆举行。他们的书法作品一下就被全国认可了,“九腕”以改革开放后在全国最早形成的书家群体而定格在中国书法史上,夯实了辽宁书法大省、强省地位。

“九腕”的诞生为辽宁乃至中国书坛吹进了一股强劲而新鲜的翰墨之风,“九腕”临帖学传统,不仅富有文化渊源,呈现书卷气,更以文墨同辉的追求与实践形成流派。

随着“九腕”在书坛影响的不断扩大,辽宁地区的书法创作日益繁荣,并逐渐形成广泛的具有梯次特点的书法创作队伍。“九腕”诞生的第二年,辽宁书协举办了“十五人书法展”,在中国美术馆与中国历史博物馆分别举办了20人参加的“北园书法展”和“二十九人书法展”,许多书法家从这几次展览中脱颖而出。

书法家聂成文说,到省书协工作后,就坚决主张临帖学古人,学古法。并于1985年举办了第一届临帖班,临帖班以古代优秀碑帖《万岁通天帖》《仲尼梦奠帖》等为范本,一些有影响力的中年书家带头临帖,推动了全省临帖活动的开展,让大家看到了辽宁书法的希望之光,临帖班孕育和开创了辽海新的书风。从1985年至今,临帖班已经举办了35届,是提高水平、培养人才的好方法,有效地提高了辽宁的书法水平,涌现出很多优秀人才。如今,临帖班已成为辽宁书法人才的摇篮。

■ 一剧一评 YIJUYIPING

## 探寻人性的幽微之地 ——我看《长安道》

赵 亮

电影《长安道》改编自海岩小说《长安盗》,“道”与“盗”虽一字之差,却从中可以窥见创作者为影片赋予的别样色彩。如果说小说《长安盗》讲述的是一个犯罪题材盗墓案件,那么电影《长安道》则超越了犯罪题材类型片的范式,不仅在结构上尝试创新,而且将“武”“戏”“文”做,所谓“盗亦有道”,影片在警匪之争的二元对立中留出一片昏暗不明的幽微之地,那就是人性。

类型片有着高度的内在规定性,这一规定性表现在自身的模式化和可复制性,具体表现在人物脸谱化、情节安排程式化、单一的价值导向等方面。1994年,昆汀·塔伦蒂诺导演的《低俗小说》问世,影片对传统犯罪题材类型片的解构与颠覆给影迷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惊喜。它在叙事上打破了遵循因果关系的线性时空序列,以一种非线性叙事结构——环形结构彻底改写了传统犯罪题材类型片的叙事语言。此后,环形结构被越来越多的类型片导演效仿,在我国,像宁浩的《疯狂的石头》、李非的《命运速递》等都借鉴了此种结构。

影片《长安道》以一场突如其来枪击事件开篇,紧接着故事以非线性叙事围绕这场枪击事件的始末快节奏展开,抽丝剥茧,扣人心弦,直至把观众带回影片开头,形成一个闭环,首尾相扣,浑然一体。然而,就在观众以全知者视角以为枪击事件真相大白、案件了结之时,却突然出现了新的线索。至此,红雨的死与案件新进展这两个高潮叠加到一起,成为影片开始反转的一个分水岭,真相尚未明了,真相还遥遥法外,观众的心再次被高悬,而且他们比之前更加迫切地想知道真相。

我们说结构几乎是一部电影的生命,电影结构符合常规是艺术在创作和接受之间早已签订的一个契约,但突破常规则是艺术在创作和接受之间所进行的一次新的谈判。正是在电影结构不断调整和创新中,电影的艺术生命才不断获得重生。影片《长安道》看似打破时间序列的无序安排,实则充分调动了观众的好奇心与兴奋点,观众必须完全沉浸其中,紧紧跟随影片的每一帧镜头、每一个细节,在脑海中将无序的安排进行排列组合,以串联起因果关系,重构事件的完整始末,才能最终寻找到答案所在。在这里,电影已并非创作者单方面的主观创作,一部电影完成度的高低与否,还取决于观影过程中观众对影片的再度创作与解读,观众话语权的提升同时意味着影片讲述者话语权的开放。从这个角度来说,电影《长安道》是对犯罪题材类型片在叙事结构上的又一次探索与突围。

此外,影片将警匪片、盗墓片、伦理片杂糅在一起,在主题指涉上并没有停留在简单粗暴的善恶之争,而是在这样一个犯罪题材的故事框架下,将叙事触角延伸至人性的幽微之地,探寻人性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影片导演将万正纲这一罪犯角色,较之以往同类型影片中的脸谱化人物进行了祛魅。不同于以往阴险狡诈、心狠手辣的罪犯角色,导演首先将其视为一个身处社会关系与伦理关系中的普通社会个体,肯定了其作为实在的人在人的存在。他表面上是知识分子,现实生活里温文尔雅,有着令人仰慕的学识与社会地位,而内心深处却唯我独尊,私欲泛滥。灵魂自我认定与名利欲望裹挟着两面煎炸,这也恰恰契合了万正纲在知识分子与杀人罪犯双重身份之间的巨大裂隙。

本来一心做学问的学者万正纲,在女儿红雨突然出现后,彻底乱了方寸。背负着抛弃妻女的负罪感,多年来找寻女儿而不得,这一次他决心做回以前的慈父,想尽一切办法来补偿对女儿的亏欠。其实晚年生活并不幸福的他何尝不是想以此来完成对自身的救赎?当他明知故犯地走上了文物盗窃的犯罪道路,与其说是不择手段为女儿创造幸福生活,不如说是借女儿之名给自己的贪欲找一个合理的借口。当然,也许这一切隐藏的私欲万正纲并不自知,他所做的这一切只有一个出发点——父爱。当这父爱就要融化了女儿红雨的仇恨之心,她要放下自己的伪装,重新回到那个小时候陪她玩警察抓小偷游戏的父亲身边时,悲剧发生。女儿遭遇枪击,这个号称要给女儿一切补偿的父亲没有时间抱起女儿急救,而是首先想到自己的犯罪事实败露,他哭哭啼啼地一遍遍哀求身为警察的女儿不要报警,就这样,在女儿绝望的眼神中他假装无辜地断送了女儿求救的唯一机会。就是这样一位父亲,他以父爱之名不惜触犯法律,又为逃避罪责而割断了父女之情。本来出于柔软无私的父爱之心,最终却做出了最残酷、最坚硬的选择,万正纲的最后抉择让观众在战栗之余产生破碎的心痛感,这背后是怎样的人性在作祟啊。

影片展开了对幽微人性的洞察与探寻,讲述者选择将故事最紧要的出口留给了残酷和坚硬,让观众在这冰冷的叙事情境中濒于绝望。讲述者决绝地撕开了人性的遮羞布,以血淋淋的方式探寻生命的本质与真相,这是一部人性残酷物语。

(作者系辽宁省文联电影家协会干部)



《长安道》剧照